

# 残酷笼罩之下的温情

观话剧《阿拉是中国人》有感

◆ 王沐文



《阿拉是中国人》作为2016年“上海市民营剧团展演活动”参展剧目,并获邀参加第二届“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·北京”,这部以上海平民抗战为题材的原创作品,主题鲜明,别具特色。

从剧名看就颇有上海特色,剧中的确也有许多老上海元素的呈现。或许上世纪,三四十年的老上海在许多人的印象中,是百乐门里莺歌燕舞的不夜城,是石库门里熙攘嘈杂的市井气。但这一回,《阿拉是中国人》里头的上海人,显得格外大气。这戏打破了上海人只顾着自个儿过小日子,吵个架也只是动动嘴皮子的偏见。其实,上海石库门里也有同甘共苦的和谐邻里关系和互相掩护的同胞情谊,上海人也有动真刀子的爱国血性,上海人也可以为成全民族大义而牺牲小我。于是乎,阿拉,不仅仅是上海人,更是一个中国人。

再看舞台上,那布景陈设,一下就把你带入了老上海石库门的生活,而那些残垣断壁则突显出1942年的战争时代背景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群像戏,有手艺人、有记者、有演员、有护士、有老板、有恶少、有白相女人等等。这类关于上海的群像戏剧作品,很容易便让人想到1939年首演的夏衍创作的《上海屋檐下》,



■《阿拉是中国人》剧照

虽然同是以老上海石库门里的生活为创作背景,但视角截然不同。《阿拉是中国人》另辟蹊径,没有着重在海派风情以及对上海小市民生活的描绘上,而是演出了上海人的义气、中国人的正气。

剧中,到底是谁杀了日本宪兵?这个攸关生死的问题就像一把刀悬挂在田雨坊每个居民的头上,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。戏一开场,日本大佐就为此枪杀了多人,并威胁田雨坊的居民十天内必须交出“凶手”,否则一天杀一个人,紧张恐怖的气氛弥漫笼罩着这个

石库门院落。戏近尾声,谜底才得以揭晓,原来是傻子用砖头拍死了日本兵。然而,在田雨坊的居民眼中,傻子不是“凶手”,而是英雄。于是大家纷纷争相承认自己是凶手,想保护这位英雄,最后老父亲拿出被害日本兵的怀表,在日本兵将他缉拿归案的同时,他毅然决然的引爆了手雷与他们同归于尽,结束了这场石库门里的平民抗战。

《阿拉是中国人》在如此残酷的时代背景下,讲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。一开场,傻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,他喃喃自语道:“两

伙蚂蚁不管谁赢都要死好多呢。”这应当是创作者借剧中人之口道出的暗喻吧,将戏的焦点放在战争本身的残酷,但在最终呈现上却偏向于温情。或许,正是因为这温情,使得整出戏太过温吞了。

谁是“凶手”这个悬念,就像一枚随时都要引爆的炸弹被埋在戏中,推动着剧情的发展,激发着戏剧矛盾,然而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,剧中人却不紧不慢地生活着、恋爱着、还去参加选美比赛,连日本大佐也要来搞一搞暧昧。戏里没有抗战的打斗场面,没有强烈的正面冲突,一切都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生。如此,或许多了一份生活的质感,但却少了些许戏剧的力度,也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。不得不说整出戏的节奏太慢了,编剧故事讲得慢,导演调度得慢,演员表演也是慢悠悠。

在抗日神剧当道的今天,这戏太正常了,这戏里的人似乎都太正常了,但正是这种“正常”才是这戏的可贵之处吧。可惜的是,虽然剧中角色各个性格鲜明,却终究没有逃脱群像戏中人物容易符号化的问题,在塑造人物方面夏衍先生更胜一筹。在舞台呈现和表演方式上,《阿拉是中国人》也未有突破。剧中热爱演剧的学生说:“中国要走的路还有很长,戏剧能让人变得聪明”。但照此看来,21世纪的创作并没有比上世纪40年代的戏更高明啊,中国戏剧要走的路还有很长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「新民文艺」

走过半个多世纪的“上海之春”,留下了大量优秀新创作品,同时也为上海市民推荐、引进了国内外精品佳作。然而,今年第33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又新推出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靓丽之作——丝绸之路音乐,其立意高,主题鲜明,是这次音乐节中的重头之戏。

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主要承办方之一,在其主要承办的13台音乐会中,共有6台音乐会的主题聚焦丝绸之路。其次还有音协及文广局主办的音乐会中都含有丝绸之路的内容,让丝路之风唱响了主旋律。从4月28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“2016丝绸之路音乐学院院长论坛”,力邀了10个国家13所音乐学院院长来沪汇聚一堂共话丝路音乐。此后陆续登场的音乐会有《海上新梦X——“丝路畅想”管弦乐、声乐新作品音乐会》、《木卡姆印象》、《“一带一路”之声——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交响乐新作音乐会》、赵季平作品音乐会以及连续三场的中亚系列音乐会: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爱乐卡姆巴坎民族乐团、塔吉克斯坦哈鲁洛·达多博耶夫民族打击乐团、哈萨克斯坦国家民族乐团。还有闭幕演出伊朗德黑兰交响音乐会,均显示出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下的文化建设思路与规划。

这次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音乐会有两大点值得关注。其一,作曲家们的原创作品都以丝绸之路上的地域性元素为创作素材,提供了全新的艺术想象与思路。上音青年作曲家钱慎瀛的管弦作品《径流》的核心音高素材,取自唐代敦煌琵琶谱古老乐谱。音乐的写作尽管以西方的托卡塔、卡农、赋格等创作技法,但似乎力图在阐述距今1000多年前荒原沙漠中的古老故事。秦毅为琵琶与管弦乐队所作的《寻》是一部非常干净利索,创作技法娴熟的作品。以琵琶这件西域传来的乐器为中介道出了胡汉乐的融合与交织,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、冲突、妥协等多重侧面。沈叶的管弦乐作品《尼雅》则以敦煌以西广袤的沙漠为背景,运用了大量异域素材交织缠绵、如泣如诉娓娓道来。音乐中感受到了年轻作曲家

## 春之新意 丝路畅想

◆ 赵维平

们的思考、激情与技法的驾驭能力。而徐坚强与吕黄的两部大型作品,大胆使用非传统的技巧与音响色彩,并紧扣主题的表现手法给人以老练、成熟之感。这次艺术节中四乐章的大型音舞诗画《木卡姆印象》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木卡姆是新疆地区普遍存在于不同地区的重要歌舞体裁。如何准确、生动地在舞台上再现其鲜活而富有感染力的场面是颇有难度的工作。上音数字媒体艺术学院代晓蓉及其团队则为此做出了贡献。舞台上多媒体布景设计理念新颖,表现力强。时间、地点、场合切换迅速。新疆一年四季不同地区的场景任意置换展示在舞台布景的大幕上。它时而草色轻轻,时而白雪皑皑,为全剧的时空感打下了基调。尤其是全剧的第四章“幸福的家园”中有阿克苏的《刀郎舞》、东疆的《哈密舞》、北疆的《伊犁赛乃木》等不同地区的木卡姆,这些风格迥然的艺术特征在舞台场景迅速切换下表现得鲜活活脱,淋漓尽致。

艺术节中的另一关注点是邀请了中亚三场当地歌舞音乐。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,它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南北朝以来就有安国(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)和康国(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)地区的大批乐人通过丝绸之路进入我国,并对中国宫廷音乐的发展产生过影响。隋代所建立的七部乐、九部乐及唐的十部乐都有安、康两国乐。今天我们听到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姆兹及卡亚克都带有浓郁草原风情。而塔吉克斯坦的手鼓、哈萨克斯坦的冬不拉更令人感到新奇与震撼。尽管这些乐器都对我国新疆地区产生影响,并有一定的传播,但是他们的音色与表现力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感染力,听了令人为之一振,耳目一新。

今年的第33届上海之春即将落下帷幕,但丝绸之路这一主题不仅为这场艺术盛宴带来了一层新意,激发了艺术创作的动力,也让上海市民深深地感悟到了“一带一路”的清晰“面容”与崭新魅力,犹如草原上一杯浓浓的陈酒深深地回味于胸怀。

## 《不读书俱乐部》 一册影集,一段音画光景

◆ 翟月琴

为年轻话剧人的梦想筑巢,是制片人刘亮佐成立阿斗工作室的理想。自去年推出《下午,四个人的美术馆》之后,中国台湾首部影集式音乐剧《不读书俱乐部》终于与上海观众见面。全新的表现形式,如同邀请观众翻阅一册影集,欣赏一段音画光景。

故事发生的书店,既是年轻人梦想展开的空间,也是制片人刘亮佐最初发现这部音乐剧的地点。环视舞台布置,一如走进中国台北的旧香居或是茉莉书店,古色古香又静雅幽香。可不同的是,这家书店却显得额外冷清。错落有序的书籍,像是正寂寞地等待读书人投以温情的目光。正中间摆放着的畅销书,从未享受畅销的待遇。桌上的夜灯或是咖啡机,因为没有主人而沦为装饰品。为读书人专设的座椅,只能兜售些甜品供路人享用。这家独立书店,正面临着倒闭的危机。书店的命运,又何尝不暗示着主人公言无吉遭遇的人生挫折?

透过音乐剧传递言无吉过往的音乐梦想,算是贴题的形式。言无吉的嗓音干净清透,声音里弥漫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。因为声画结合,完全打破了空间的界限,使得故事在柏林与台北之间跳跃。舞台上流动的场面,妥帖地配合着琴声、人声,完全不受故事时间的制约,自由地穿梭于过去和现在。在雨中,撑着雨伞的街头路人缓缓而行,牵引观众回到柏林的冬季,回到与女友甜蜜相恋又痛苦分开的时光。故事的叙述沉浸在音乐里,观众的焦点无论怎样跳跃,最终都会移向主人公言无吉的肢体表达,多变又不夸张。女友离开后,言无吉感到自责与痛苦。他放弃学业回到台北,试图挽回那段不曾精心经营的恋情。言无吉与书店

老板的情境化表演,讲述出言无吉花了三万元买下来当初二人相识的书店,一直等待女友的到来。无关的路人、书店老板退出舞台,书店又还原了它寂寥的模样。在精心布置的小书店里,言无吉经历着憧憬、苦闷、压抑与悲恸的等待。这漫长的等待,既是书店之所以能够支撑下去的唯一理由,也是人生必经的旅程。这段旅程中,过客同样可以收获风景。

全剧的特别之处,就在于“影集式”的新形式。顾名思义,每一段故事都如同结集的相片,记录着人生的特别时光,又连缀出难忘的美妙经历。而角色的扮演者,无论是唱腔、歌词还是表演,都显得生动诙谐、惟妙惟肖、妙趣横生,引起观众捧腹大笑。从叙事角度而言,将这些人物叠加于言无吉的人生经历中,无疑丰富了“等待”的内容、延长了“等待”的时间。从人物动作的动机来看,围绕着“希望”展开,一切行动都成为追求梦想的注脚。这册相片的合集,可看作主题式影集。

以“不读书俱乐部”命名,无疑蕴含着制片人刘亮佐的忧虑和期望。一个面临倒闭的书店,有如没有未来的年轻话剧人。而不读书的年轻人,就好像不懂得慢生活的人群。这部戏之所以吸引刘亮佐,大抵也有感于追求梦想的过程。就好像剧里北京女孩声情并茂的读书方式,反而打动了言无吉,教给他以声音诠释故事,以动作表现情节的读书方式。而无法实现戏剧表演梦想的北京女孩,却在台北书店一边打工一边释放着梦想的力量。于是,强烈的目的性反而淡化了,收获的却是音画光景。遗憾的是,收获的喜悦又如何衔接失去的痛苦,全剧也没有相应的展现,从而造成主题的淡化。